

论日常生活*

郑 震

提要:日常生活是社会生活中对于社会行动者或行动者群体而言具有高度熟悉性和重复性的实践活动,是一切社会生活的社会历史性的基础。然而也正是在日常生活那前意识的不言而喻的实践中蕴含着力量的差异、知识的运作和利益的争夺,以及由此所带来的隐蔽的暴力和不平等。虽然日常生活的不言而喻的表象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日常政治的社会历史性的暴力,但是日常生活世界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依然导致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张力的存在,一种准意识的反抗已经在日常生活中展开。由此可见,深入细致地研究日常生活对于反思当代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日常生活 生活世界 实践 情境 政治

伴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的迅速变革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表现,日常生活日益受到中国社会学的关注。但人们更多地关注各种具体的日常现象,如社会分层、流行文化、劳动分工、居住空间、消费活动、家庭生活等等,但却没能对这些问题所寓于其中的日常生活本身作为一个专门的对象加以广泛地思考,以至于我们研究了许许多多的日常现象,但对日常生活整体的意义却所知不多。^①甚至很多时候人们似乎遗忘了日常现象来源于日常生活的事实,在把握局部的同时却将整体作为一个平凡琐碎、无足轻重的领域而加以忽视,这削弱了对那些日常现象的理解和把握,个别的日常现象只有在日常生活的整体中才能够被真正地加以理解。而对日常生活整体的研究当然也不可能脱离对各种日常现象的关注,人们只能通过研究各种日常现象来透视日常生活,这不同于对个别日常现象的孤立思考,它将这些个别的现象作为日常生活的构成因素放在生活世界的整体中加以探究,从而超越了流行观察的狭窄视野。应当说,关注日常生活的个别现象和关注日常生活整体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厘清日常生活整体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无

*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文责自负。

① 这里所谓的“整体”并不具有系统论意义上的整体性内涵,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我们有关社会整体的提法,后文将阐明这一点。

疑更是当务之急。本文正是要将日常生活作为一个社会整体中的整体现象来加以考察,并以此建构起一个日常生活社会学的理论框架。

鉴于西方社会学的日常生活理论广泛地困扰于主客体二元论(郑震,2012),我们将力求以一种非二元论的方式来展开论述。与此同时,我们将破除传统思想中广泛存在的时空二元论的论调,从而在一种时空的总体性中发展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理论建构。我们从情境这一独特的概念出发来描绘日常生活的具体存在,试图以具体时空中的共在的实践活动来超越内在与外在的抽象,从而真正地摆脱一种二元论的视角。我们将权力、知识、利益这些日常生活的核心的分析性要素的情境运作视为一种广义的政治现象。这里之所以采用“政治”一词,并非意在将社会理论还原为政治理论,毕竟我们所谈论的政治是普遍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的广义的政治,并非属于传统的政治学的范畴,而是强调支配与斗争是日常生活乃至更加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生活的基本议题。我们否认日常生活的权力在一种无意识的压抑中发挥作用,权力在分析上的前意识特征更加符合日常生活那不言而喻的表象的逻辑。而日常生活的权力更多地是以一种更加温和与隐蔽的方式来发挥作用,它的口号是“为你好!”在广义政治的视角中,我们突出了“准意识”的重要性,以此来批评传统理论过分依赖于诸如意识和无意识这样的非此即彼的二元概念,从而忽视了在日常生活的政治中以前意识为其主导的更具过渡性质的“准意识”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正是准意识的反抗为我们揭示了日常生活那貌似平静的表面下所隐含的张力。

我们一定程度地忽略了对各种日常生活理论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研究,忽略了对某些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的思想的清理和辨析,从而在使用一些概念时回避了对其所包含的历史多样性的阐发,并且有选择地针对某些理论思想进行探讨,没有进行系统的理论梳理。为避免将大量的篇幅用于思想史的比较分析使文章偏离其主线,因此我们在以下的讨论中更多地回避了这些重要的思想史问题,它们被设想成一项与此处的研究有所不同的崭新的研究。

一、日常生活的情境

情境这一概念所诠释的是社会时空的特定状态。日常生活并不是

一个抽象的名称,它意味着具体的实践。因此我们必须从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境入手,以澄清日常生活的本己特征。所谓的在日常生活中即总是在特定的社会时空中,这就意味着特殊的空间性和时间性的整体,亦即是特殊的关系性(即空间性)和可能性(即时间性)的总体(郑震,2007:14-25)。作为情境之本己特征的时空性并不是量化的形式,相反我们所讨论的是富有社会历史意义的日常生活的时空性,它先于对象化的数学物理语言而存在着,它为我们传达的是前科学的实践的本体维度,也就是实践的社会历史意义。因此,从情境入手来探讨日常生活也就是揭示日常生活的本体论维度是一个时空性的建构,日常生活总是在具体的可能性和关系性的总体中展开其存在。

日常生活的情境当然不可能外在于日常实践,谈论情境就不可能不谈论实践,反之亦然。但是我们反对以一种主客体二元论的方式来理解情境与实践的关系,仿佛情境构成了一个结构性的客体层面,而实践只是主体在情境中的活动,于是便错误地认为:或者是情境约束着主体的实践,或者是实践建构了情境的结构,抑或是情境与主体作为两种彼此外在的对象而相互作用。应当说无论是还原论还是相互作用论都没能摆脱笛卡尔主义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它们都不可避免地设定了二元分化的状态,从而虚构了内在性和外在性的实体性(既可能是单方面的虚构——如还原论,也可能同时虚构了双方——如相互作用论)。如果我们意识到情境本身乃至由情境所建构的更加广大的社会历史环境就它们的社会历史性而言并不是外在于行动者们及其实践的客体化的事实(在此我们将现实的物理维度置入括弧),它们并不可能获得一种在本体论上外在于实践的客观实存,它们的现实性在实践之中,这不是作为某种实体的存在,而是一种内在于具体实践的非实体的超越了纯粹偶然性的力量,它表明实践并不是虚构的自由意志的产物,它已经具有了某种否定个体主义想象的社会历史特征。而与此同时,实践总是行动者的实践,正是能够有所实践的行动者(或者更准确地说行动者们)在具体的物理环境中建构起情境的社会历史性,这不是一种社会决定论和机械论式的再生产,而是以本体论上不可彻底还原的主体的能动性建构起一种超越了绝对个体的社会历史状态,这一状态的必然性本身就是在充斥着行动者所带来的无限的偶然性和特殊性中呈现出来的。不存在完全相同的两个情境,即便是同一类型的情境也总是具有各自的偶然性和独特性,但却存在着具有相

似意义的情境,情境又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特定的或者说有限的必然性和一般性。在此无论是偶然性、必然性还是独特性、一般性都是相对而言的,情境实践的生产和再生产既不是机械的复制也不是任意的选择,它超越了主客体二元论的理论虚构。因此情境的时空性也就是实践的时空性,情境的物理设置(从家庭的陈设到公共场所的设施)只有在与实践的关系中才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意义,尽管这些设置的存在往往也是实践展开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意义并非其固有的因素,意义是一种人类学的特征。由此可见,对日常生活情境的研究在根本上也就是对特定的日常实践的研究,情境的关系性和可能性也就是实践的关系性和可能性,实践在本体论上就是时空性的。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阐明日常生活实践的关系性和可能性的基本特征,这便是日常生活的特征所在。

日常实践最为醒目的特点之一便是它的熟悉性,对于日常的个体而言,日常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亲切和熟悉的世界,日常生活正是在一个人们所熟悉的生活世界之中的生活。这一熟悉性可以用“得心应手”、“司空见惯”、“熟视无睹”这三个日常的词语来加以诠释,不过日常话语也常常将现实掩盖在一种似是而非的表象之下,以至于引导人们满足于一种日常的状态,采取日常行动者的态度,而这恰恰是理论的反思要竭力回避的。得心应手意味着日常的行动者在面对日常事务时总是不成问题。而与之相对的成问题的状态则意味着困难、生疏甚至不知所措,这不可避免地使个体至少在某些方面脱离了日常生活的熟悉状态(我们在后文的研究将表明,完全脱离日常生活意味着彻底丧失社会生存的可能性和关系性,意味着死亡)。在日常生活的得心应手的状态中,实践的可能性并不是一些需要有意识地进行甄别和选择的备选方案,情境中的他人和他物也总是与个体关系默契,因此个体并不需要采取一种对象化的态度来确定如何行动(胡塞尔,2001:176;Heidegger,1999:99);实践的可能性与关系性以不成问题的方式进入实践,这仿佛是一种即兴的活动(Bourdieu,1977:78),无需行动者的深思熟虑。司空见惯表明日常行动者早已习惯了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日常生活的高度熟悉性通过一种习以为常的状态呈现出来,人们并不会为身边所发生的日常事件而感到惊讶,他人和他物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的到场对我们而言不成问题。然而也正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那样得心应手和司空见惯,因此我们往往陷入熟视无睹的

状态,它表明日常生活与我们是如此的切近,以至于我们无法拉开距离来审视日常生活,但这同时也意味着麻木,因为它最大限度地搁置了反思和质疑的目光。日常生活的事件总免不了被个体冠之以“正常”的名称,这一对日常现实的正常化意味着对行动者而言一切仿佛都是理所当然的,人们不去反思自身和他人的日常行为,不去质疑人们为何如此行动,因为一切都在得心应手、司空见惯和熟视无睹中被赋予了最高的合法性,剩下的只有不成问题、习惯化和非反思。不过也正因为熟视无睹,使得日常生活这一最熟悉的现象成为我们生活中最陌生的现象之一,人们满足于日常生活那不言而喻的表象,满足于实践的不成问题和习以为常,在理所当然的表象中忽视了日常实践的社会历史生成,在一种对意识不透明或半透明的前意识的支配中对现实盲目信仰(如果摒弃布迪厄有关“压抑”和“结构的逻辑优先性”的假设,那么这类似于布迪厄所说的实践的错觉[Bourdieu, 2000:102])(郑震, 2007:26-28),^①甚至将这一实践中的暴力误以为是自在的真理(下一节将讨论这一问题)。

日常情境的熟悉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日常实践的高度重复性,这一重复性不能等同于简单的复制,它是在情境的偶然性和独特性中所呈现出的一种在特定时空中的相对的必然性和一般性。日常情境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各种相似的变样,这种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发生的重复组建并强化着日常情境的熟悉性,并且构成了日常实践的又一重要特征。我们暂且可以将日常生活定义为:在社会生活中对社会行动者或行动者群体而言具有高度熟悉性和重复性的实践活动,日常生活的时空是一个为人们所熟悉和不断重复的时空。日常生活的此种无所不在的高度重复性意味着日常实践总是在再生产着各种例行的常规,这些常规构成了日常情境的核心。而人们之所以能够得心应手地再生产各种常规活动,其关键就在于对一整套日常实践方法的掌握,也就是掌握某种常规,正是这些方法的不断重复的运用确保了日常实践的重复性和例行化(有关例行化的问题可参见 Goffman, 1959:16、97;吉登斯, 1998:133)。这一实践的方法正是我们所强调的实践的可能性和关系性,它意味着我们可能以何种关系而生活,意味着我们在与他人和他物的关系中可能如何行动。这显然不是一种孤立的行动,它具有一种共

^① 有关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的划分问题的详细讨论可参见郑震,2007:25-28。

在的相似性,我们的存在总已经是一种与他人的共在,在我们自身的存在中总已经固有力地肯定了他人的在场,就如同在这些他人的存在中我总已经以一种本体论的方式而在场一样,我总是与那个我所归属的群体中的他人共享着某种实践的方法,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我与他人完全同一(个体的社会经历和群体归属的多样性,以及日常实践方法本身的不确定性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有关实践方法的不确定性可参见 Wittgenstein, 1980:39; Bourdieu, 1990:77);但一种共在的理论意味着不再徘徊在单子主义的还原论的阴影之中,它同样也反对任何整体论的还原。因此一种共在的立场意味着对主客体二元论的超越,意味着不再深陷任何还原论的桎梏,它以共在的名义主张一种能动主体之间的共同实践,这个主体的主体性总已经是一种社会历史性,而后者则只有在前者的共同实践中才得以生成和变革。

实践的方法不是一种机械论和决定论的法则(Wittgenstein, 1999: 74),并不存在仿佛具备了某些条件而个体就将如何行动的决定论法则。实践的方法是情境因素的复杂多样相契合的模糊的方法,它意味着个体的即兴创造和权宜举措,以至于人们不可能仅凭一些所谓的条件就能够对实践进行精确的预测。不过尽管实践的方法遵循一种模糊的逻辑,但是同一类型的实践还是在各种偶然性和独特性中显示出某种意义的相似性,换句话说,在同一类型的情境中(这里的“同一类型”当然有其时空的限制,我们并不否认在不同的社会历史状况中,表面上看似相同类型的实践可能有着实质上的差异,在这一意义上它们最多也只具有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家族的相似性”[Wittgenstein, 1999: 31 - 33],而不具有本质的相似性),人们具体实践的千差万别并不能够掩盖其实践正是对某种共同的社会历史意义的各种可能性和关系性的现实化,我们总是能够在这些实践中发现某种类似的文化价值取向的前意识的合法化,虽然每一个情境都是独特的、不可复制的,但是同一类型的日常情境又总是在不断地重复着对某种社会历史意义的合法化建构和再生产。日常实践的方法本身就是此种意义的法则,意义总是对情境的多样性敞开着(此处并未论及意义的社会历史的多样性问题),日常实践的高度重复性就其根本而言是指意义或者说实践方法的高度重复性。具体的内容可以千差万别,但这些内容却再生产了共同的常规。所以我们所谓的实践的必然性并不意味着某种明确的因果法则被不可避免地加以执行,而实践的一般性也并不

意味着某种类型的实践在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它们充其量只是表明,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时空中,某种类型的实践共同再生产着特定的意义,此种意义本身并不具有在话语层面的明确的内涵,它只是没有确定数量的一系列可能性和关系性的统一的名称,但它在实践中的生产性的存在却能够为特定群体成员的一系列同一类型的日常实践提供统一的文化价值取向。

我们以上的讨论已经涉及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日常生活的实践及其意义对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具有基础性的作用,这是日常实践的第三个也是最为重要的特征。早在胡塞尔晚年的生活世界理论中就已经揭示了生活世界的基础性地位(胡塞尔,2001:176),他将生活世界视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基础性的世界,它是一切理论和非理论活动的前提和基础(胡塞尔认为他的先验现象学是一个例外,但这不过是其认识论的客观主义立场的谬误)。而直接推动和参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的日常生活转向的列斐伏尔则在不同的立场上提出:“日常生活可以被界定为总体中的社会实践的一个层次”(Lefebvre, 2002:31),并且是那些可以外在于日常生活的高级的、分化的、高度专门化的活动得以生成的基础(Lefebvre, 1991:85 - 87;2005:41、57、123)。这些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基础性的论断挑战甚至颠覆了传统主流社会学将日常生活边缘化和次要化的偏见,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社会历史意义,而当代西方社会学以日常生活为主题和视角的日常生活转向便从侧面肯定了日常生活的重要性。高度熟悉和重复的日常生活实践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要件,没有那些看似平凡琐碎的日常情境就很难想象那些看似远离日常生活的充满了陌生、新颖和挑战的社会活动能够有效地进行。日常生活不仅为它们提供了各种辅助性的基础实践(例如在科学的研究中操作仪器设备、采用科学方法、从事基本运算、按惯例收集数据信息等等),同样重要的是,正是日常生活为那些超越日常生活的活动提供了动机激发的条件。^① 日常生活世界是为社会生活提供基本意义的

^① 对于动机所激发的行动而言,激发动机的信念无疑发挥着间接的作用。当然信念或实践方法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动机激发的领域,毕竟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时候并不需要此种动机激发。而动机所激发的行动也总是或多或少地与信念的实践结合在一起,动机所激发的意识活动并不孤立地发挥作用,即便是高度对象化和反思性的科学研究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大量信念的直接支持(如仪器操作的信念、语言实践的信念、科学方法的信念以及关于真理的信念等等)。

世界,这一世界所包含的各种日常实践构成了我们现实生活的主体,正是这些不言而喻的活动支撑起人类社会的大厦。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社会的出现包含着日常生活的奠基性的一场重要变革,但这并不像列斐伏尔所主张的那样,仿佛日常生活经历了从与高等文化观念的一体性向与高等文化相分化但不分离的状况的转变(Lefebvre, 2002:31、119、321)。事实上,现代社会的高度分化状况主要体现为由工具理性所主导的社会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高度发展,以及社会群体和文化的日益多元化;而日常生活并不是作为一个层次而被分化出来,日常生活从来都是社会整体的一个基础性层次,那些高于日常生活的活动从来都要以日常生活作为其存在的前提。只不过与现代高等文化相比,前现代的高等文化的专业化和系统化的程度远为逊色,而现代社会的专业化过程的确制造了越来越多的门外汉,这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引发了列斐伏尔有关从“一体性”向“分化”转变的错误论断。事实上,问题的实质是日常活动与非日常活动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和比例的变化(例如,某些在前现代社会中由常识来加以支配的方面,在现代社会中则可能转变为由专业化的知识来加以掌控),以及现代日常生活本身的分化和专业化(任何专门化的领域都有其日常生活的基础),它们并没有改变日常生活作为基础层次的本体论特征。列斐伏尔的判断与他对前现代社会的人道主义想象和对现代日常生活的异化批判有着重要的关联(郑震,2011),而他尽管正确指出了现代日常生活的基础性地位,但是把这一现象归咎为工具理性所主导的社会分化则显然是缺乏经验根据的。然而现代日常生活的确经历着某种分化,这是现代社会分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现代日常生活由此比前现代日常生活更为分化和多元化,每一个分化出的社会领域都有其日常生活的基础。日常生活世界的前反思和非专题的基础地位不仅意味着我们绝大多数的社会活动都是不言而喻的日常实践,而且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表明了人之社会历史存在的局限性(郑震,2007:3)。这也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抛弃了胡塞尔为其纯粹现象学所保留的认识论上的客观主义,转而以所谓的解释学的循环来强调一切解释都有其不可取消的先入之见(Heidegger, 1999:192),而伽达默尔则在海德格尔的影响下强调此在存在的历史性,他写道:“历史地生存意味着对自身的知识永远都不会是完全的”(Gadamer, 1999:269)。任何反思性和对象化的活动都不可避免地有其社会历史性的前提条

件,也就是说不存在绝对客观的认识(Bachelard, 1984:108、172),一切认识活动都有其社会历史的局限性。不过现代社会的高度反思性的确使得日常生活世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日益受到对象化的关注(有关现代社会的高度反思性可参见 Giddens, 1990:38 - 39),以至于现代日常生活的确比前现代日常生活更加难以广泛和持久地维持其不言而喻的表象,越来越多的日常情境被高度反思性和对象化的目光所关注,进而被揭开其看似不言而喻的面纱(但这并不意味着反思性的挑战必然能够颠覆人们对日常实践的不言而喻的信仰。毕竟只要使特定实践得以顺利运行的社会历史条件依然存在,只要实践的共在基础依然稳定,人们对特定实践的信仰就很难受到实质的挑战)。不可否认,现代社会的高度分化和反思性的增强将现代日常生活置于更加多样化、更少确定性和更多易变性的境地。但这既不意味着日常生活的没落或即将消失,也不意味着生活世界的本体论地位的改变,毕竟我们绝大多数的社会活动依然是不言而喻的日常实践,而任何反思都不可避免地有其非反思的先入之见奠基于它自身的生活世界之上,因此现代日常生活所经受的反思性的挑战并未在根本上改变日常生活在社会本体论上的基础地位。

到此我们可以将日常生活界定为:在社会生活中对于社会行动者或行动者群体而言具有高度的熟悉性和重复性的奠基性的实践活动,日常生活的时空是一个为人们所熟悉和不断重复的时空,是一切社会生活的社会历史性的基础。

二、日常生活的政治

我们在此所谈论的“政治”并非专指党派和国家统治的政治,而是意指广义上的利益和力量的差异所导致的支配和斗争的关系。不可否认,狭义的政治的确构成了广义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影响显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超出了其自身狭窄的范畴,并以那些更为宽泛和隐蔽的政治活动作为自身存在的基础。日常生活的政治问题就如同任何政治问题一样,就其实质而言只能是利益、权力和知识的问题。以一种分析性的口吻我们可以说:利益是政治活动的明确或潜在的目标和基础;权力是生产、控制和争夺利益的力量差异,这一力量差异是广义的

知识的现实化的产物,并且总是围绕利益的不平衡而形成的;而知识则是由权力内在地加以建构的合法性和技术性(就该词的广义而言)的文化因素,它不可避免地利益彼此纠缠、相互作用。如果我们意识到任何权力都不可能独立于利益而存在,^①意识到权力总是关于利益的权力,是生产、争夺或基于利益的权力,那么我们就并不难理解,当我们在谈论权力的时候同时也就是在谈论利益。与此同时,福柯富有启发性地指出了权力与知识之间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关系(Foucault, 1977:27),但是由于福柯针对现代日常生活所研究的权力现象主要是纪律权力这一特殊类型(它依赖于高度对象化的知识生产,如人文科学的知识。它主要通过一些专门的机构来加以实施,如学校、监狱、军队、工厂等),而且福柯错误地以监狱作为纪律权力的范例(Giddens, 1981:172),这使得福柯的权力思想无法为理解现代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运作提供直接和有效的支撑。福柯没有能够充分地考虑同样与权力彼此内在的日常生活的前反思、前对象和前话语的知识(也就是日常实践的信念)。我们并不否认纪律权力可能在日常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但是纪律权力并不是我们所讨论的日常权力(纪律权力的对象化特征和机构性的运作使之不可避免地被行动者认知为一种对象化的力量),尽管纪律权力的确可能是日常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等著作中的研究已经表明,纪律权力的运作可以作用于对身体信念的建构。日常生活的权力主要是以前反思、前对象和前话语的方式发挥作用,就其根本而言,它是一种前意识的权力或信念的权力,它最多也只是准对象化、准反思性和准话语性的(或者说准意识的);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层面,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大量在前意识和意识之间的过渡状态,我们将那些没有在根本上摆脱前意识的直接支配作用的过渡状态称为是准意识的(当然这一划分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它往往因人而异或因社会时空而异),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准意识所包含的无数变样依然处于日常生活世界的范畴之中;此刻,生产权力的知识就其根本而言依然是不言而喻的信念,虽然个体时常会有意识地使用一些知识话语来指导自己的日常实践,但这并不意

① 我们所谈论的是广义的利益,即不仅局限于狭义的经济利益,广义的利益描绘的是被赋予了特定的社会优越性的稀缺性的差异特征,因此例如荣誉和声望也同样是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它们也可以和经济利益进行交换。

意味着个体的行动是由高度对象化和反思性的话语的命题所主导的,因为这些被个体所使用的话语知识在实质上不过是以信念为其主导的不言而喻的教条(之所以是教条就在于人们并没有真正地反思其社会历史性的存在,而是采取一种盲目的信仰——赋予其不言而喻的真理性,此种状况在学术的日常生活中也并不鲜见)。在囊括了信念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充分地指出,权力与知识并不彼此外在于对方(我们扩展并改造了福柯的论点[Foucault, 1978:98]),它们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在权力和知识的关系中,我们排除了福柯赋予权力的本体论的优先性。如果日常权力是一切日常实践所固有的力量差异,那么它只能是信念所生产的力量差异,是信念的现实化的力量状态。没有权力,就没有信念的现实化、没有信念的生产和再生产(权力是行动的现实力量,它推动着生成与变革);没有信念,权力也无法生成,权力不可能不是某种行动方法的产物(信念是实践的方法,理论性知识是对象化行动的方法,尽管后者要以前者为其社会历史存在的基础,但是它们还是构成了现实的并非绝对的两极,它们之间存在着无穷的变样,我们此前所谈论的知识教条就是其中的一种)。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对象化知识和权力的关系。由此可见,谈论权力和知识在本体论上何者优先是没有现实根据的。此外,如果撇开利益的维度,那么就无法理解权力—知识何以生成且究竟何为。只有在权力—信念—利益所构成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体中,我们才可能充分有效地研究日常生活的政治。

日常生活的权力既没有福柯所描绘的统治权的明目张胆和大张旗鼓,也没有福柯所谓的纪律权力的严格缜密和冷酷无情(至少表面上如此);而更重要的是,日常权力并不是行动者试图取舍或反思的对象,而统治权和纪律权力则或多或少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例如,通常所谓的对统治权的争夺——事实上人们争夺的其实是拥有某种资源并且能够发号施令的统治地位;再如纪律权力总是免不了或多或少地沦为反思的对象,而一旦此种反思引发个体的抵触和反抗,就将给纪律权力的运作带来不小的阻碍,就像吉登斯所指出的:“福柯的‘考古学’(在其中人类并不创造他们的历史,而是在历史中随波逐流)并没有充分承认那些屈服于统治群体的权力的人们是有认知能力的能动者,他们反抗、钝化或积极地改变其他人试图强加于他们的生活环境。福柯所言的纪律所生产的‘驯顺的身体’,结果证明毕竟常常并不如此驯顺”(Giddens, 1981:172)。日常权力的前反思、前对象和前话语的特征

(这当然也就是生产权力的信念的特征——当我们谈论日常权力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也是在讨论信念,而权力—信念的此种特征也暗示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为捍卫或夺取某种利益而实践着)表明实施权力的个体就其根本而言处于一种前意识的状态,个体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一种权力正在他的实践中运作,而这又不同于无意识,因为如果实践是无意识的,那么无意识的压抑作用将阻碍信念对实践的直接生产,压抑的作用和信念的不言而喻性显然是彼此矛盾的,不言而喻的信念显然无需一种压抑作用来加以控制,压抑所针对的只能是与个体的信念处于尖锐对立状态的因素。由此可见,日常权力所暗示的日常生活的政治就其根本而言是一种前意识的政治(它最多也只是以前意识为主导的准意识的政治),它在一种实践的不言而喻中被合法化了,对于日常行动者而言,它是亲切和熟悉的,它总是在不断地重复着自身的存在,但其本来的面目却没有被觉察。这与日常生活的政治建构行动者的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在此所谈论的“建构”仅仅是一种分析的提法,因而并不意味着一种主客体二元论的立场)。日常生活的政治并非以明目张胆和大张旗鼓的方式强加于个体,它也无需对时空的斤斤计较的设计和安排,它散布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之中,并没有什么意向明确的战略规划,没有蓄意实施的意识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一切都看似自然而然。以一种分析的口吻我们可以说,个体正是在这样的日常情境中将一种隐蔽的政治秩序内化为自身实践的法则,而这一秩序也正是日常行动者集体实践的产物。例如,对于每一个新生的个体,周围的他人和事物并不是作为某种需要加以选择和思考的对立面而呈现在日常生活的情境中(婴儿缺乏反思能力这一事实更加深了这一效果),日常生活的情境往往只是作为“客观的”事实呈现给他。人们以理所当然的方式来对待婴儿,他们根据婴儿的生理性别为他添置玩具、布置陈设、穿衣打扮、规划未来,甚至连说话的措辞和语调都有着明确的性别取向,他们与婴儿的互动渗透着特定的教育背景、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消费偏好等等特征,而这一切主要以不言而喻的方式作为“客观的”处境而将婴儿纳入自身的怀抱,人们的所作所为往往充满了情感和关爱,并且很少显示出某种强制的特征,除非遇到强烈的反抗,否则人们总是循循善诱、诚恳耐心。此种情境的不断重复在婴儿的观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一烙印将在其一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此种社会化的分析并不仅仅适用于缺乏反思能力的婴

儿,只不过婴儿的案例最能够清晰地为我们展现日常政治的社会化逻辑。这一逻辑的关键就是在行动者的意识中抹去日常政治的痕迹,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通过实践参与对某种政治的再生产,权力并没有被作为权力来加以对待,人们甚至否认自己的实践中隐含着对利益的生产和争夺。当知识分子宣称自身的学术实践是不为世俗利益而献身于真理的事业时,布迪厄则明确地指出,包括学术场在内的任何场域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利益的因素:“与经济学家所说的自然的、非历史的或一般的利益不同,利益在我看来是在一个游戏、任何一个游戏中的投入,它是进入这个游戏的条件,并同时由这个游戏所创造和强化。因此有多少个场,就有多少种利益形式”(Bourdieu, 1990:48)。换句话说,利益既不能够局限于狭义的经济利益,也不能够仅仅在意识的层面来加以理解,对利益的生产和争夺并不必然需要某种关于利益的动机,日常生活的利益争夺往往是以前意识的方式展开的,相关的个体甚至具有对利益的有意识的排斥(以牺牲经济利益的方式去献身于对真理的探究,恰恰掩盖了学术领域中最主要的利益斗争,这就是有关荣誉、声望、学术地位的斗争,尽管个体往往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甚至真诚地对之加以否认)。日常生活的政治是隐蔽的政治,这种理所当然的隐蔽性和意识层面的无知最大限度地捍卫了日常政治的稳定性,也使得日常政治所可能包含的消极因素最大限度地逃避了质疑的目光,甚至连这一政治的受害者也在无意之中成为再生产其合法性和暴力性的同谋者。正如布迪厄在研究现代社会的男性统治时所指出的:“这部历史不能满足于记录女人被排斥出这个或那个职位,这个或那个等级,这个或那个学科;它应该也要考虑到和意识到(职业的、学科的,等等)等级和等级所支持的等级配置的再生,等级配置致使女人协助别人将她们自己从她们无论如何都要被排斥出去的地方排斥出去”(布迪厄,2002:115)。正因为隐含着政治暴力的实践的方法对受害者而言是不言而喻的信念,他们理所当然地参与建构了一种强加于自身的暴力,他们所实施的权力正是用于反对他们自身,他们并未意识到正是他们自身那看似自然而然的实践活动使得一种将其自身置于不平等地位的现实得以不断生成。性别的不平等并不总是以明目张胆的歧视和压迫而显现出来,它常常只是通过两性的日常实践而被共同地加以生产和再生产的。只需要看一看在我们的社会中所充斥着的各种有关性别的职业偏见和学科偏见(它们与实际存在着的职业和学科的

性别分化相对应),以及众多女性对这些社会历史性的偏见经常采取的或多或少的认同态度,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

总之,日常生活的政治将社会历史性的偏见和暴力掩盖在不言而喻的表象之下,日常生活的权力往往隐蔽在温情和关切之中,明目张胆的强制和暴力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次要手段(只有当其中的一方打破了原本理所当然的情境,从而被视为是故意的破坏者或危险分子的时候,人们才可能有意识地诉诸强制和暴力),它们难免会破坏自然而然的和谐氛围,使原本不触目(海德格尔语,参见 Heidegger, 1999: 112)的现象成为问题。日常生活的政治是建构人之奠基性的社会历史存在的政治。因为组建着个体的生存情境的其他个体(他们以前意识或准意识的方式充当了驯化的牧师)都怀着理所当然的信念,因为情境中的事物都在他人的行动中显现为生存所不可或缺的“客观现实”,因为只有通过这一建构,个体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然而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可能最终以自身的社会历史性的存在捍卫了某种社会历史性的偏见和暴力。由此可见,日常生活并非像其表面所显示的那样在一种理所当然的秩序中运转,日常生活也并非像其表面那样平淡无奇、琐碎无聊,它充满着利益和力量的博弈,充满着任意和专断、支配和斗争,因此日常生活并非只是一个令人乏味的平淡无奇的领域,日常生活世界作为基础性的社会世界并不缺少斗争与超越的惊奇,只不过它更多地是暗流涌动,而非波澜壮阔。日常生活的亲切和熟悉往往导致将实践的暴力自然化的错觉,正是这种错觉所导致的盲目信仰将日常生活的政治隐蔽在不言而喻的表象之中,仿佛日常生活外在于人类社会的暴力和不平等,仿佛日常生活与社会的斗争和革命无关。而日常生活的高度的重复性,一方面是日常生活的熟悉性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它也为日常生活的表象披上了平淡无奇、琐碎无聊甚至微不足道的外衣,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日常生活的政治的忽视和遗忘。因此,揭示日常生活政治的关键就是要对日常生活的神话进行除魅,日常生活的神话学是日常生活政治的合法化表象。

日常生活的神话学总是不遗余力地推动对时间的遗忘并制造一种空间霸权的表象。对于日常行动者而言,日常生活的时间性仅仅是再生产实践内容的时间性,总是熟悉的生活在不断地重复着既定的节奏,并且仿佛就是周期性的循环和重复。这意味着生活永远在过去而不在将来,因为将来不过是过去的重复,现在就是这一重复的现实化。事实

上我们并不否认日常生活的情境必须从过去中汲取其存在的可能性,这本身就表明日常生活的存在并非是先验的存在而是社会历史性的存在,日常生活的超越总是社会历史性的超越,日常生活的将来就其可能性而言总已经是过去着的将来,而日常生活的过去作为存在的可能性也正是将来着的过去,过去总是指向将来,而并非已经过去,将来总是回到过去,而并非突如其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实践内容的简单重复和无所创新,日常行动者的错觉就在于将日常生活神话为永恒的未来,仿佛存在的可能性就是内容的重复性,一切新颖的变革似乎都只能来自于日常生活之外,而日常生活本身不过是理所当然的周而复始。此种对时间性的误解在实质上导致了对时间的遗忘或者说否定,因为时间不再意味着历史性的生成、持续和变革的整体,它仅仅是一个空洞的名称,或者只不过是钟表加以量化的客观均匀的节奏——一个空洞的形式。日常的时间不成问题,因为它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因此也就无需为之操心,更不必期待对日常生活的内生性的改造和超越。日常行动者将时间抛在脑后,其实质是对日常秩序的自然化,从而没有意识到变革现实的可能性正是来源于日常生活(Lefebvre, 2002:351),更不可能意识到即便是无所创新的再生产也不能消解时间维度的本体论地位和历史性特征,时间不可能从属于空间,空间总是时间的或历史的,就如同时间总是空间的,时间与空间不过是赋予同一社会历史整体的不同名称。而对日常时间的遗忘直接体现为把日常生活理解为一系列既定的空间关系中的生活,空间的关系被固化为客观的实在,从而人为取消了它的历史性特征。个体与他人和他物的关系成为从来如此的事实,它们遵循着理所当然的法则,日常生活仿佛凝固在既定的空间中,空间似乎取得了相对于时间的霸权,空间不再是在时间中变革的空间,空间的时间性仅仅是关系的重复性,时间退化为一个节奏的常量,它从属于既定的关系,而日常生活则在其不言而喻的秩序中扩展其空间的统治(人们遗忘了他们所经历的日常生活不过是一种社会历史性的实践产物,它始终向社会历史的变革敞开)。日常生活总是一切照旧,仿佛惟一现实的就是不变的关系,不再有历史的超越,有的仅仅是永恒的关系。然而这一切都仅仅是一个神话,这一常识的神话甚至还有其理论的翻版,例如主张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正是来自于日常生活的列斐伏尔在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却也陷入了空间霸权的论调(郑震,2010)。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日常生活的奠基性在一种前

反思的状态下为其理论提供了神话的教条,他误以为常识所建构的空间霸权便是经验事实本身,而这一错误的判断与长期统治着西方思想的时空二元论的教条见解一拍即合,并使他误以为时间的变革意义即便来自于日常生活也只能是与资本主义日常空间相对立的因素(列斐伏尔完全可以更为合理地设想两种社会时空之间的对立,或资本主义社会时空本身的内在超越性——资本主义的社会时空并不是一个同一性的时空),以至于即便列斐伏尔批判这一“空间霸权”的虚伪和暴力,他还是将其现实化了,甚至错误地在时空的二元论中谈论解放的时间和空间的霸权之间的斗争(这又隐晦地提出了一种生产解放空间的时间的霸权,从而陷入了时空二元论的怪圈)(郑震,2010)。事实上,无论是常识见解中的时空二元论和空间的优先论(或者时间的优先论),^①还是理论思想中的类似观念都不过是社会历史性的幻觉,只不过理论的幻觉奠基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幻觉。这一事实为我们深刻揭示了反思日常生活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

日常生活的神话正有赖于人们在常识的偏见中安逸舒适,而日常生活的政治正是在此种安逸中获得了最高的合法性,它最大限度地逃避了反思和质疑的目光。因此,研究日常生活的政治必须揭开其神话的外衣,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时空,在一种时空整体性的视野中对日常生活去自然化。不是用时间的优先性去取代空间的优先性(就像人们用空间的优先性取代时间的优先性那样)(郑震,2010),而是在时空的整体性中思考日常生活的政治。我们必须意识到日常生活并不是围绕僵化的空间关系而展开的周而复始的过程,日常生活的空间性和时间性在本体论上是一体的,空间关系并不是固定的实体,它是实践的不确定的关系,它不仅是历史性的关系,同时还向历史的变革敞开。日常生活的永恒的表象不过是日常生活的高度熟悉和重复所制

① 在西方社会学的历史中,时间的优先论在很长的时期里占据着主导地位(Soja, 1989: 15; 哈维,2003: 256-257),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巨大的社会变革凸显了社会发展的历史特征,当这一特征与西方传统的时空二元论相结合,便推动了一种强调时间的优先性的历史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然而在当代西方社会学的领域中,伴随着资本的全球化运转、大规模的城市化以及通过消费社会的兴起而带来的日常生活重要性凸显等因素,空间这一分析维度的重要性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从而构成了对历史主义偏见的质疑和挑战。但是当代西方社会学的空间转向依然困扰于时空二元论的偏见,而日常生活的空间化错觉也很大程度上参与构造了对当代社会的空间优先性的幻觉。

造的幻觉,而日常生活变革的相对缓慢也的确助长了此种幻觉,列斐伏尔写道:“日常生活很可能是变得最缓慢的东西,并且一旦它遇到任何困难,它甚至可能再一次采用旧的形式,回到陈腐的老一套中去”(Lefebvre, 2002:34)。

我们以上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对日常生活政治的理念类型(ideal type)式的考察。我们在大多数时候人为地悬置了日常生活世界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问题,以及由其所带来的各种分裂和斗争的倾向。日常生活的整体并非一个系统论意义上的整体,我们只是就其作为社会总体的基础层次而言笼统地称之为一个整体。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的活动和社会领域的运转,它们彼此之间或者仿佛一些碎片相互并置、彼此疏远或松散地联系在一起;或者密切合作、彼此共生,在相互的交换和依存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或者在各种幻觉的支配下维持着一种看似不言而喻的和谐;又或者在差异和对立中孕育着各种矛盾甚至冲突的可能性,从而在相互的排斥中紧密关联。这表明日常生活并不是一个同一的系统(Lefebvre, 1984:97-98)(我们对这一判断的实际理解与列斐伏尔并不完全一致,我们主要是针对当代中国社会所呈现出的区域差异、群体差异和社会分工的多样性来理解这一问题的),不存在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统一起来的同一性的逻辑,日常生活并不具有结构功能主义者所设想的系统性的功能结构,这同样也决定了以日常生活为其基础的社会世界的整体特征。不过,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性和排斥性显然并不仅仅局限于日常生活的论域,它们虽然起源于日常生活,起源于人们在工作和闲暇之中的日常实践(这至少从一个方面暗示了日常生活正是社会变革乃至社会革命的直接或间接的可能性和关系性的来源),但是它们以其对反思性和对象化的激发而最终引入了狭义的党派政治和国家政治的问题,后者显然并非我们此处的研究对象。不过值得指出的是,日常生活这一基础性的层面无疑也是现代国家所高度关注的层面,日常生活的政治作为国家政治在民众生活中合法性存在的基础而成为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福柯所谓的纪律权力无疑就是国家在各种机构中训练民众的一种重要的力量。作为国家代言人的政府,通过学校等机构中的纪律权力的运转,试图让国家政治的价值观念去建构民众的信念,从而为其统治奠定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基础。与此同时,纪律权力的局限性也使得政府不可能仅仅依赖于它,

政府往往会对那些有助于其统治的日常生活的政治有意或无意地采取鼓励和扶植的政策,而对不利于自身统治利益的日常政治采取约束、控制甚至禁止的措施(社会科学的反思性无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统治者甚至可以采用立法的方式来捍卫自身的统治利益,以将某些实践宣布为非法的方式来推动自身合法性政治的日常建构。法律的道德基础本身就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显示了国家政治力量对日常生活政治的干预和再生产。例如,新政府对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加以保留和废除。不过日常生活的变革并不像诸如生产技术的变革那样可以在短时期内更新换代,对旧的日常生活信念的废除和对新的日常生活信念的建立不是行政和法律的手段能够一蹴而就的;政策法规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颁布施行,但是它们所推行的政治理念的日常化则只能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这也就是为什么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往往是变化得最慢的。事实上,尽管统治的力量可以对日常生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强制的方式废除某些旧的实践方式,并强制人们以合乎统治利益的新的方式去行动。但是由此所引发的高度的对象化和反思性的过程则在根本上阻碍了日常生活的建构,人们在实践中会意识到由政府所推动的新的生活方式并非是自然而然的,这与日常生活的不言而喻性有着天壤之别。日常生活的信念是人们长期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习惯性遗忘的结果,被遗忘的是信念本身的社会历史性,而信念则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记忆,这是意识层面的遗忘所成就的深层次的记忆(尼采,2000:37、38)。这不是一种高度对象性的习得,不是在意识层面的理论性把握的结果,而是不断实践的产物,是在反复的做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存在的惰性,人们不再将特定的实践方式视为一种外部的强加,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不言而喻的状态,个体所体会到的是一种自主的释放,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甚至将某些社会历史性的实践活动视为与生俱来的秉性。例如,人们有时错误地将某些后天习得的性别认同视为先天的特征,这是个体从婴儿时期就开始的潜移默化的性别实践化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性别特征与生理的性别特征彼此呼应,甚至在观念中相互混淆,以至于人们往往会夸大自身性别的生理范围,把许多原本只是社会历史性的性别建构误以为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

不过我们并不认为对日常生活压迫的反抗仅仅是一个超越日常生活层面的狭义的政治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依然存在着大量处于前意识

和意识之间的过渡状态,例如我们所说的准意识的状态,^①它本身也是一个笼统的名称,包含着不同程度的变样,我们只能说它更多地还是由不言而喻的信念所主导的,但的确引入了一些意识因素(例如对社会差异和不平等的意识)。准意识反抗的存在也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揭示了日常生活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广泛接触所孕育的张力(当然就准意识的状态而言,这一张力的显现依然处于日常生活的范畴,只不过某些细小的情境变化就可能使其滑向日常生活的边缘,甚至转变为对象化的活动)。米歇尔·德赛托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便一定程度地为我们描绘了此种准意识的反抗。德赛托一方面指出,实践的知识对实践者而言是无意识的(de Certeau, 1984:71),与此同时他又如此描绘他所谓的弱者(或被统治者)实践的艺术(即战术,以区别于他所谓的强者或者说统治者的战略):“战术是一种特意计划的行动,是由缺少一个适合的地点所决定的”(de Certeau, 1984:36-37)。无意识和特意计划之间所显示的矛盾状态揭示了德赛托缺乏一种明确的准意识理论,只有在我们所描绘的准意识的状态中,德赛托所描绘的弱者的战术才是可理解的。这同时也表明,德赛托笔下的弱者的艺术并不是狭义政治意义上的抵抗活动,事实上,它的高度日常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反抗的有效性。不可否认的是,颠覆的可能性和关系性尽管来自于日常生活,但是只有在高于日常生活的层面才可能真正地组织起有效的反抗,它们需要有意识的计划、组织和观念的指导,否则便很难想象一种有效的政治斗争能够形成(德赛托的理论恰恰缺失了这一有效的政治斗争的维度,他否认弱者可能形成自身的战略,从而放弃了总体革命的可能性。德赛托并没有向人们证明其所谓的战术能够推动一种真正的社会变革,战术并没有构成对统治秩序的实质性的威胁。这也使得他所讨论的战术很可能蜕变为一种精神的鸦片)。不过尽管如此,日常生活的准意识的反抗的确构成了狭义政治革命的重要基础之

① 事实上并不存在绝对的意识状态,严格地说任何活动都或多或少地有其日常生活的维度。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不仅是因为意识活动的动机激发需要前意识的奠基,而且是因为任何意识活动都或多或少地伴随着各种前意识的活动。例如,甚至在高度有意识的科学研究中也充斥着大量高度实践性的教条,如实证主义者对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客观方法和因果决定论的运用就是一例,而当今对实证主义的反思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些立场不过是一些社会历史性的人为建构,只不过当一种行为是以意识为其主导特征的时候,我们便称之为是有意识的活动,从而也就将其视为超出了日常生活范畴的活动(至少就其有意识的方面而言是这样)。

一,它们是体现和再生产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和张力的一种重要方式,没有它们的长期和广泛的存在,有意识的政治革命将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尽管弱者的艺术有可能沦为统治秩序的安全阀机制,但它的确显示了人民不是傻瓜(de Certeau, 1984:176);即便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依然存在对自身不利处境的抗争,只不过此种抗争的方式体现了对统治群体的常识性的反感和排斥,它主要局限于具体情境中的不被统治者所察觉的微妙的利益转换,采取的主要是统治秩序所容忍的范围内的开小差式的越轨行为,也就是德赛托所谓的假发(La perruque):“假发是工人自己的活计,它被伪装为为他的雇主所干的活”(de Certeau, 1984:25),从而缺乏对敌对战略的整体反思和阶级或群体层面的政治自觉,因而无法构成对统治秩序的实质性的挑战。即便“假发”因为暴露而引发正面的冲突,后者常常也只是少数个体卷入的局部事件,很少能够产生更加广泛的政治意义。

三、结束语:日常生活的社会学与当代中国社会

我们以上的研究无疑试图为理解和批判当代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提供一套概念分析的框架。它试图以一种时空性的共在视角来超越现象学的主体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客体主义对日常生活的二元争论。它力求对日常生活加以形式化地梳理(这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形式化,而是对经验现实的社会历史性的形式化抽象,因此它与那种形而上学的绝对形式概念无关),并从日常生活的广义政治入手来寻找一种日常生活批判的视角,从而为实际的研究提供一种可能的路径。^①

但必须指出的是,我们的看似抽象的研究不乏对3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的参照,这一变迁常常被误以为仅仅是自上而下所推动的,事实上,正是日常生活为这场变迁提供了最原始的动力。这不仅是因

① 必须指出的是,以下的讨论突出的是近30年来中国社会日常生活变迁在形式上的一般特征与倾向,这一讨论没有进一步细致地划分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也没有针对日常生活的不同领域而展开,我们乐于将这种更为具体的研究留给未来的探讨,它们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日常生活的研究并非社会理论研究的全部,对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更高层次的社会现象的研究对于社会学而言显然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在探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问题引入制度层面的体制分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种研究显然已经超越了日常生活研究的范畴,从而应当留给一种新的专门研究来完成。

为改革的决策不能被还原为某些决策者的意志,我们必须在当时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的层面去寻找决策的动力,正是日常生活的广泛危机为改革的动机激发提供了契机——陌生性导致了成问题的状态;而且也是因为如果没有日常生活的真正变革——为决策提供前论断的合法性,任何决策都将只是少数统治者基于自身信念的空想。也正是日常生活的巨大变革为这场变迁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它揭示了最基本的存在的关系性和可能性的改变,即本体性社会时空的跃迁(它从过去的危机中汲取可能性的同时也展现了无法被过去所推论的跳跃,后者固然包含对象化的中介,但真正使得此种对象化获得其有效性的机制却依然是日常生活共在实践的遗忘与记忆)。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社会的变革不能仅仅局限于那些高于日常生活的层面,缺乏日常生活之相应转变的社会变革将难免失败的命运(Lefebvre, 2005:29)。我们不能想象仅仅是行政力量的推动或是人为地改变某种生产方式就可以解释这场社会转型;这场变革意味着民众的信念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在分析上同时也就意味着日常生活世界的结构的变迁(因此,只有引入时空的视角才能够真正地理解日常生活的本体论意义)。事实上,只有当一项改革政策所倡导的观念真正进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也就是在民众广泛的共同实践中被不断地重复,从而转化为人们高度熟悉和共同分享的共在的信念的时候(或者说信念化为民众的存在,而不是作为对象被加以权衡),这一政策才可能真正地获得有效性。这并不是一种自上而下地实施外部强制的结果(对象化的设计和推行既不是前提也不是结论),仿佛个体不过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消极的承受者,事实上,许多政策在推行上所遇到的来自日常生活的阻力恰恰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证明了那种无视个体能动性的强制性理论的局限性。^① 而我们所主张的共在理论正是要打破那种主体主义和客体主义的非此即彼的二元论状态。不过日常生活的转变往往是十分微妙、甚至难以察觉的,这也就是人们易于忽视日常生活的基础地位的原因之一。日常生活并不是在大刀阔斧中实现其自身的转向的,

^①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阻力的存在意味着相关的制度化缺乏日常生活的合法性基础,从而暗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变革隐含着巨大的张力,后者是大量且迅速的制度化过程和日常生活之间的急剧失调与错位的产物。我们不当武断地给这些阻力一概贴上消极的标签,事实上它们向各种可能性敞开,既可能构成一种阻碍合理制度化的消极力量,也可能体现了对制度缺陷的反抗,如对过度的工具理性化的反抗。

法彻底排除矛盾的显露及其所带来的张力,而各种日常的反抗也正在广泛地涌现(网络中以匿名的方式大量出现的对现实不满的言论或调侃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显然一定程度地突破了前意识的盲从,但日常生活的反抗仅仅是一种准意识的反抗,它那高度常识化和含蓄的特征则表明前意识在此依然发挥着主导的作用(这些微妙的反抗信念构成了日常生活反抗的重要基础)。之所以是常识化的就在于日常生活的反抗缺乏系统的反思和自觉的组织,它通常只是停留在理所当然地表达不满或以阳奉阴违的方式得过且过,而尚未进入高度对象化和理论性的政治对抗。之所以是含蓄的就在于日常生活的反抗是相对温和的,它总是避免直接的对立和激烈的冲突,也就是说此种反抗的氛围有助于维持一种不言而喻的表象,从常识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分寸”(匿名的牢骚是含蓄的,它易于被贴上“正常”的标签,从而也就最低限度地维持了一种理所当然的表象)。然而日常生活的准意识反抗的长期和广泛的积累完全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刻激发起突破日常生活的集体力量,尽管在准意识的反抗和集体层面的有组织的政治诉求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

到此我们不难看出,日常生活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和基础问题。日常生活是这一变革的动力源泉,是其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基础,同时也是阻碍和干扰这一变革的力量来源,并且构成了这一变革所引发的诸多问题得以展现的最深刻和最微妙的斗争场所。

参考文献:

- 布迪厄,皮埃尔,2002,《男性统治》,刘晖译,深圳:海天出版社。
- 哈维,大卫,2003,《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海默尔,本,2008,《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胡塞尔,埃德蒙德,2001,《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吉登斯,安东尼,1998,《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北京:三联书店。
- 尼采,弗里德里希,2000,《论道德的谱系》,谢地坤译,桂林:漓江出版社。
- 郑震,2007,《作为存在的身体》,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2009,《身体图景》,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2010,《空间:一个社会学的概念》,《社会学研究》第5期。
- ,2011,《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社会学意义——迈向一种日常生活的社会学》,《社会学研究》第3期。
- ,2012,《当代西方社会学的日常生活转向——以核心理论问题为研究路径》,《天津社会科学》第5期。
- Bachelard, G. 1984, *The New Scientific Spirit*. Trans. by Arthur Goldhammer. Boston: Beacon Press.

-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0,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Trans. by Matthew Adams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0, *Pascalian Meditations*. Trans.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de Certeau, M.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 by Steven Rendall. Berkeley,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lias, N. 2000, *The Civilizing Process: Sociogenetic and Psychogenetic Investigations*. Trans. by Edmund Jephcott. Oxford and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rans.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Trans.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 Gadamer, H. G. 1999, *Truth and Method*. Trans. by Garrett Barden & John Cumming. Sheed and Ward Ltd.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影印本)
- Giddens, A. 1981,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I):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 Heidegger, M. 1999, *Being and Time*. Trans. by John Macquarrie & Edward Robinson. SCM Press Ltd.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影印本)
- Lefebvre, H. 1984,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rans. by Sacha Rabinovitch.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1991,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1): Introduction*. Trans. by John Moore. London & New York: Verso.
- 2002,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2): Foundations for a Sociology of the Everyday*. Trans. by John Moore. London & New York: Verso.
- 2005,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3): From Modernity to Modernism (Towards a Metaphilosophy of Daily Life)*. Trans. by Gregory Elliott. London & New York: Verso.
- Soja, E. W. 1989,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 Wittgenstein, L. 1980, *Remarks on the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 (Vol. 2)*. In G. H. Von Wright & Heikki Nyman (eds.), trans. by C. G. Luckhardt & M. A. E. Au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9,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 by G. E. M. Anscombe. The Macmillan Company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影印本).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 杨可

strategy for NGOs to compromise with the government, while “belief and responsibility”, “professionalization” are the baseline, which is more crucial than “economic foundation” among the internal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GOs’ autonomy.

The Embeddedness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into the Power Relations of Urban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government service purchase

..... *Zhu Jiangang & Chen Anna* 43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embedded development is becoming the strategy of China’s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However, this optimistic anticipation encounters countless challenges in reality. This paper chooses a typical case of government service purchase to show the process of adaption and challenges to the local social work in the community, after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ers embed government purchase into the original administrative social work. The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e process in which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ers are becoming more administrative in external serving, more bureaucratic in internal control and more of licentiation after being introduced into the power network of the community. Moreover, the complexity of power relations in a community limits the depth of social workers’ involvement in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which lessens the impact of the superficially brilliant social work in a community. Finally, the authors argue that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ers need proper value in the equity of allocating resources and need alliance with local social workers, which could push the democratic reform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On Everyday Life *Zheng Zhen* 65

Abstract: Everyday life means highly familiar and recurrent practices of social actors and social groups in the social life. It is the socio-historical base of overall social life. Nevertheless the preconscious self-evident everyday practices contain the difference of power, the operation of knowledge, the fighting for interests and the consequent concealed violence and inequality. The self-evident presentations of everyday life conceal the socio-historical violence of the everyday politics to a great extent, but th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everyday life-world still bring about tensions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with different interests, so a kind of quasi-conscious resistance has been unfolding in everyday life. Therefore, the thorough study of everyday life is very important for reflecting o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of China.